

# 第八章

## 卅三、卅四、 卅五中隊

### 第1節 特種作戰飛行

我的空軍生涯可以粗分為三個階段：一是飛行員時期，二是接掌空運隊和擔任總統座機長時期，三是主持特種作戰部隊時期。

由於我曾主導空軍的特種作戰任務，有些人便將我與神祕傳奇畫下等號；其實我並不神祕，也不傳奇，只是一介盡職做事的國家軍人而已。真正在天空寫下傳奇，畫下不朽身影的，是那些深入敵境、冒險犯難的年輕英雄們。參與特種作戰任務的日子，緊張忙碌而驚心動魄，今日回憶起來，仍有刻骨銘心的深切感受。空軍弟兄們每次出任務時，如在夜間，我則在家中，望著天空的月亮，掛念著他們的安危而無法入眠。只等清晨接到他們安全降落的報告後，才如釋重負地把心放下來；如在白天（U-2），我則守在電話旁，等著他們落地的消息。這些健兒生死一線，面對死神挑戰，向上帝借時間；無分寒暑，冒險犯難。國人完全不知道，他們才是真正傳奇的無名英雄。

若是有飛機過了時間仍未出現，那種心情更加難以描繪。尤其是P2V和RB-17機加裝反電子裝備後，機上人員擴編為十四人，一架飛機的失去，就是十四位同袍手足的失蹤，就是十四個家庭的破碎。那種傷痛和不捨，以及面對哀痛逾恆的家屬，無言可安慰的苦楚，令人永生難忘。

## 第2節 卅三中隊（三八三一部隊）

1958年8月，空軍第八大隊撤銷，以該大隊所屬卅三中隊人員裝備為基礎，於1959年3月1日成立「三八三一」部隊，「三一」的意義為紀念蔣公復行視事的日期。駐地仍用原空軍第八大隊卅三中隊新竹隊址。

此一特種部隊由空軍情報署督導，當時我正擔任情報署署長。三八三一部隊利用八大隊撤銷時遺留之P4Y型海上巡邏轟炸機兩架，經自行加裝長程油箱，拆除所有活動砲塔和炸彈艙，及其他有關炸射所用之附件；復經多次試飛改良，遂成為長程運輸機。

該部隊主要任務為空投。運補武器彈藥軍需品及人員，至泰緬寮三角地區的游擊隊（代名為「大興碼頭」）。1960年底，大興碼頭由駐泰空軍副武官包炳光上校率同工程官實地勘察後，在湄公河岸修成臨時跑道一條。先借調松山基地專機中隊C-47機一架，做跑道試降；至1961年初再向屏東六聯隊借調C-46機一架，試降成功後，即大量執行該地區運補任務，借調人員增至六十餘員。爾後就由P4Y和C-46兩型機執行任務。

在P4Y機部分：裝載武器彈藥及補給，上午由新竹起飛，先抵屏東基地，加滿油量（可留空長達十八小時之久），人員略事休息；再起飛直航西沙群島，保持海上低空五百呎高度；再由越南硯港上空登陸，爬高至安全高度，直航目標區——大興碼頭。這樣，到達目標區

時，已是天黑，可免緬甸空軍攔截。經地空信號連絡後投下補給品，再沿原航線飛回新竹基地。一般留空時間均在十七小時半左右，回到新竹基地時，多為次日晨七時許。

在C-46機部分：裝載人員及武器彈藥（機身內加裝長途油箱一具），由屏東起飛，經西沙、硯港，降落「大興碼頭」山坡之超短跑道上（單向起降）。降落時間及再起飛時間，必須把握在天色尚未完全變黑之前行之，因跑道無燈光及夜航設備；故降落後卸下補給品及若干多餘之油料，便得再起飛，直航曼谷機場。當時我們與泰國友善，使用曼谷機場無需事先許可；僅在我機接近時報以預先約定之暗號，即可獲准降落；並與當地油公司訂約，暗中為我機加油，然後再由曼谷起飛，經越南、西沙，回返屏東基地。此項任務最困難的，是大興碼頭的起飛與降落。

1961年2月，機長梁棣中校率同七位組員，駕P4Y機由新竹直航「大興基地」，在泰緬邊境上空遭遇緬甸空軍戰鬥機三架圍攻。我機力圖迴避，而緬機窮追不捨，我機又無武裝可以抵抗，在眾寡懸殊情況下，被緬機擊中，墜毀在泰境清萊附近；除航行員劉朝臣上尉及通信官王翔雲中校跳傘獲救外，其餘機員全數殉職。

為加強泰緬邊境游擊隊戰力，我當局決定運送特種部隊至該區。但在與緬軍一次戰役中，我方慘敗，除很多兵員被俘外，標明美援圖案及字樣之武器，亦均為

緬方所獲。他們持此向聯合國控訴；再加上此次墜機事件，使我政府在國際上極被責難。遂于1961年4月，我空運隊出動，將反共救國軍全部撤回。此次撤軍，定名為「國雷演習」，我空運隊圓滿達成任務。回憶往事，當局維護由雲南撤出之部隊，在緬泰邊境建立游擊隊據點，並暗中予以補給，以作來日反攻大陸之用，不失為一著好棋。但政府操之過急，不但大量運送貼有美援標誌的彈藥，而且公然運送約千名特種部隊前往該區，引起中共注意，而發動緬軍向我突擊；在我特種部隊尚未完成部署時受到重挫，連以前慘淡培養的一點游擊力量都削弱殆盡，甚為失策。

八大隊大隊長原為我的同學時光琳，他不但負領導大隊之責，也與隊員們一齊飛行。有一次他駕駛P4Y出任務至緬泰一帶空投，那一次任務花了約十七個多小時，安全落地後，才向我報告。我很佩服光琳的勇氣和與隊員共生死的精神；但他違犯了規定，就是部隊長未經特許，不可服行作戰任務。原因是萬一被俘，就有被逼洩密的可能，為此我向光琳發了一陣善意的火，當然這並不能掩蓋我對他的欽敬。

### 第3節 卅四中隊（西方公司）

1952年6月，「西方公司」奉命成立，由當時大陸工作處負責協調與派遣，直接受命於蔣夫人宋美齡女士。在空軍第十二偵察中隊內，選派飛行人員劉新民

（後改名劉貫霄）、戚榮春、王德輝、張德亞等，另在空中運部隊選派領航員孫永慶、潘其煊，通信員陳若堯、李力群，機工長滕運峰、劉德真等，與美籍顧問雷斯特等混合編組，執行大陸西北、西南包括川康一帶地區空投任務，是為空軍另一支特種部隊之起源。

當時的空軍負責人為作戰署署長羅英德，使用裝備包括改裝之B-25機二架，繼用美方供給之B-17機一架，並加裝油箱，增加航程。其間亦曾租用民航空運隊（CAT）C-54機一架，該機之後勤支援，則由民航空運隊負責。

「西方公司」每次出任務時間，約為下午四時左右起飛，黃昏時分進入大陸領空，利用夜幕掩護飛行，航行高度自低空五百至二萬八千呎不等。空投完畢返降桃園基地，已是次日上午八、九時，航程長達十餘小時。

當時共分為兩個機隊，一是戚榮春（後曾任華航總經理）率領的機組，在半年內出特種空投任務十次，主要在川、甘、青、康一帶。另一機組為王德輝統率，二個月內出任務三次，主要在川、康邊境的松潘附近。

1953年6月，該單位擴大編組，與美方籌組特種部隊於桃園，繼續擔任大陸空投任務，定名為「西方企業公司」。嗣後遷駐新竹，改稱「空軍特種任務組」，並擴充作戰人員為四組。同年10月，又接收RB-24及C-46型機各一架，充實戰力，加強空投。

1954年3月，開始使用B-26型機，拆除武裝，執行

任務。1956年8月16日，改由空軍情報署督導。1957年5月，開始執行電子偵測任務，同年7月15日，改組為「空軍技術研究組」。1957年底接收P2V-7型新機，裝備技術更為精進。1958年1月起對外使用「空軍第卅四中隊」番號。1963年3月又接收C-123型機五架，納入該隊作戰序列，長期留駐越南，協助友邦執行對北越地區特種作戰任務。1966年5月接收P-3A型機二架，以加強對大陸地區偵察任務。1967年1月25日起，P2V及P-3A之作戰任務停止，C-123機任務仍繼續實施。至1972年3月，全部人員裝備，由越南返防新竹基地。

我在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任上，就聽說有一個「西方公司」，由最高當局直接指揮，以改裝的B-17飛機，專做大陸工作，並由美國人駕駛，組員則由中國空軍派任。因非我管轄範圍，又事屬機密，我並未特別注意。

直到1956年，「西方公司」除繼續執行空投任務外，並開始對大陸施行電子偵察，蒐集電子情報，以應軍事需要。又將RB-17機加裝反電子裝備，機上作戰人員由原有之七員，增為十四員，任務地區亦更為遼闊。也因此，「西方公司」的管轄，由原屬空軍作戰署轉移到情報署，我才開始接觸到「西方公司」。

有一天，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找我，與「美海輔助軍通訊中心」（NACC, 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s Center）負責人克萊恩（Ray Cline）會談，成立了一個電子偵測單位，也就是後來的「卅四中

隊」，接收了原「西方公司」的全部人員與裝備。其主要任務，是將精密電子儀器裝在飛機上，飛行中國大陸上空，偵察中共的防空電子系統，亦即對空雷達設施。道理很簡單，即我飛機飛入大陸上空時，中共防空雷達必然開啟，以監視我機動態，並引導他們的飛機攔截。但他們的雷達一開啟，我機上儀器即可測知，記錄下他們雷達的性能，如波段、方位等。這些資訊對具有攻擊武力的空軍作戰非常有用。因為在你進入敵人上空時，可干擾敵人的雷達電波，使它不能測出你的位置、高度和速度，因而他的攔截機或地對空飛彈，就無從瞄準目標，也足以癱瘓敵人的防空系統，使進犯飛機免遭狙擊。這些資訊，對我國毫無攻擊能力的空軍，無多大作用，但對美國而言，其重要性則非常之大。1960年，我訪問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，他們的情報處長史密司少將（M/G Robert Smith），帶我到地下五層的指揮中心參觀，並出示B-52戰略轟炸機所用的地面目標卷夾（target folders）。其中對中共的主要軍事設施資料，大都是我U-2所拍的中國大陸重要軍事目標的照片，以及中國大陸的防空電子資訊。他說若無這些資料，則他們的轟炸機及攻擊性飛彈，根本無目標可尋，亦無法進入中國大陸。由此可見，我空軍這項任務，對美國全球戰略之重要性。可惜我最高當局，並未能充分利用這張「王牌」，向美方提出相對的要求，甚至有時還勸止我因爭取裝備而向美方所表現的強硬態度。

我從作戰署接管卅四中隊後，隊部設在空軍新竹基

地新建的辦公室，隊員宿舍則在新竹「東大路」；大家也都叫那營舍為「東大路」。那裡原來是婦聯總會的地產，交給一位美國牧師，原是準備蓋一所教會學校的。我即向當時婦聯總會主委蔣夫人的秘書孫怡芳商洽，要求使用那塊地，蔣夫人也同意。於是由美方出資，蓋了宿舍、餐廳、俱樂部等，有很夠水準的設施，使我空軍人員有一處安全、保密而又舒適的營房。

空軍在1955年，另有一項「獵狐計畫」，以新換裝的P4Y四引擎重型巡邏轟炸機，執行長程偵察巡邏，由十九期的呂德琪擔任機長。該機組深入大陸，曾多次蒙蔣公召見嘉勉。1956年7月，「獵狐計畫」併入卅四中隊。

1962年10月開始，卅四中隊除繼續執行電子偵察及空投任務外，並兼行核子爆炸偵察，以監視中共對核子武器發展之狀況。1963年3月，利用美方供給的五架C-123機，長期留駐越南，協助友邦空投空降，以支援美軍在那裡的戰事。

卅四中隊（西方公司）自1953年至1967年12月底止，共執行特種任務八三八架次。總的來說，卅四中隊經過了三次演變：一是1953年的「西方企業公司」，然後遷新竹基地、改稱「空軍特種任務組」（組長王秉琳），1958年改稱第卅四中隊。首位中隊長為十五期的殷延珊，後為郭統德、孫以晨及趙欽等人，前三位均已陣亡，幸趙欽仍然健在。他們的戰績輝煌，「蝙蝠中隊」

的英名永留史冊，我空軍及國人當永誌不忘。另外，在聯絡及策劃方面，均由王秉琳及朱潮負責。他們均徹夜不眠，善盡職守，其功亦不可沒。

我在1965年離開了督導卅四中隊的任務，而這個沒人知道卻光榮存在的單位，終於在1974年4月1日正式奉命撤銷編號。

回想卅四中隊，心中對這些弟兄充滿了無比的敬意。四十多年來我們仍保持密切的聯絡，常常聚會連繫。1998年5月，一位曾於1959至1962年由美中央情報局派駐新竹參與卅四中隊任務，後由美國防部退役的高級文官傑克遜先生（Mr. Donald Jackson）透過李崇善向我提議，他們擬邀集曾參與ECM計畫的美籍顧問來台訪問，會晤老友。我對此深表同意，並積極展開籌備工作，同時訂名為「卅四中隊1999團圓在台灣」（34th Squadron Reunion 1999）。

經過年餘的籌劃，承蒙國防部、空軍總部、中華航空公司、中國空軍退役人員協會、圓山飯店等單位大力協助，這群中華民國空軍史上最神勇的作戰部隊的中美友人，共計六十餘人，在分別了近四十年後，終於在1999年10月重逢於台北。

10月6日在圓山飯店金梅齋的迎賓宴上，久別重逢的喜悅，蕩漾在每一位飽經憂患、歷經風霜、曾經共患難的老戰友臉上，熱烈的情緒幾乎沸騰。特別令人感動的是，已高齡八十四歲，身體狀況極差的寇茲上校

(Col. James Coats)，和身患三種癌症，難以嚥食的何曼少校 (Major William Homen)，他們非常懷念在台灣的朋友，克服萬難隨團來台以償宿願。何曼並設計多種徽章、掛飾、運動衫等禮品贈送大家以為紀念。已在美定居的王秉琳、郁文蔚及定居加拿大的高蔭松也專程回台與大夥團聚。在台的老戰友：張疆、金祖聖、朱震、法勇華、符景治、韓東聲、黃盛年、黃文駿、李邦訓、劉鴻翊、柳克鏢、呂德琪、呂鴻俊、毛連生、宋雍華、戴樹清、鄒立徐、王振中、吳鍾珍、吳國禮等人踴躍出席多次聚會。我方人員全力款待，十天的行程，拜訪、參觀、遊覽、豐盛的晚午宴，緊湊而充實，幾乎每一位貴賓都表示：這一次的台灣之行，是他們一生中最愉快難忘的旅行。我個人最感欣慰的則是，我們在台的卅四中隊弟兄，雖然大家均已兩鬢飛霜，但身體多還健朗，生活與家庭也都平安美滿，免去我許多掛慮。

此次聚會圓滿落幕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學弟們夏功權、虞為、趙欽、張維烈、李崇善、歐陽漪棻、空總政戰部的幾位年輕弟兄、中華航空公司公關室楊辰、石炳煌主任及其他同仁；特別是我的秘書瞿慧蓮小姐，沒有他們實質的幫助，實在難竟其功。唐飛部長在九二一賑災的百忙中，仍關心此事，派人贈送禮物，在此一併致謝。這些美國朋友在回國後仍不斷表現對十日歡聚的懷念，特別是傑克遜與何曼兩位，經常透過瞿秘書與我們互通音信，此種友情彌足珍貴。

我更懷念在烽火中為國捐軀的一百四十七位弟兄。那些無名英雄，用身軀築長城，用熱血保國魂；這些年輕的生命，來不及走完生命的精華，即默默而去。今天藉由我的回憶錄，向他們致上最崇高的敬意。

在西方公司時，我們第一批損失的菁英，是1954年5月聶經淵、韋盛和、范聰傑等三名上尉和士官長李必成等以及陸軍支援空投的戴晴川、王夢鱗和孔昭曄共七人，駕B-17機在福建上空遭高砲擊落，全機人員陣亡。

1955年4月，劉貫霄少校駕B-26機執行空投任務，全機六人在台灣海峽上空失蹤。1956年在江西上空又損失了一架B-17，上有組員十一人。

我督導卅四中隊之後，雖然組員每次出航皆驚險萬狀，屢遭共軍高砲及米格機攻擊，但均能化險為夷，圓滿達成任務。直到1959年5月，一架B-17遭米格機攔截，墜毀廣東恩平附近，全機連機長徐銀桂等十四人壯烈殉職。

最值得一提的，是1960年11月，機長戴樹清與組員十三人駕P2V深入大陸，在河南遇上Tu-2機；我機利用地形，於飛近前面山峰時，突然向右做低空迴避轉彎，敵機因尾隨過緊，且速度較大，轉彎不及，而撞到山峰左側，爆炸焚燬，一時火光沖天，照徹夜空，我軍健兒才得以安然返回。

1961年11月，我們在遼東半島損失了一架P2V，共有機長葉霖等十三人。過了三個月，1962年1月，又一

架P2V在黃海墜海，又損失了機長郭統德等十三人。1963年6月機長周以栗飛的一架P2V在江西遭圍攻，全機組員十四人壯烈成仁。1964年6月，機長孫以晨飛的P2V在萊陽遭四架米格機攻擊，十四位組員亦全體為國捐軀。

在數次未完成的任務中，最幸運的，要算1957年11月5日由王為鐸、孔祥璋及領航員李復權駕B-26，做大陸東南沿岸偵測及散發傳單的一次任務。他們在傍晚起飛，黑夜到來時，由福建進入大陸；就在進入大陸後，忽然失去連絡。次日共黨廣播說：該機在福建墜毀，推測機員生還的機率很少。王、孔是十大隊的老戰友，而領航員李復權則新婚甫數月，新娘是台灣姑娘，家住新竹，我們除盡力安慰他們的家屬外，也別無良策。不料，在他們失事八個多月後，忽接消息說他們機毀人安，被中共俘虜，後又釋放，現在三人已被送至香港。得此訊息後，即刻奉准把他們接回。經與美方交涉，由他們派機到香港，接他們到花蓮，住進我們的一處招待所。同時，由美方從華府調來三位專家，攜有測謊器，與王為鐸等三人共處了兩週餘，做了很詳盡的詢問，並做出一百餘頁的偵訊報告。結論是：他們是清白的，未受共黨「洗腦」的影響。我拿著這份報告，呈給蔣經國，蒙他准許王等復職，並改派中華航空公司服務。數年後孔祥璋不幸失事殉職，王在華航退休後不久也告病故，據知李仍在美國過著退休生活。這整個事件，可說是先悲後喜，更感激經國先生對我們的信任，特准被俘

同志返營復職，一視同仁，毫無疑慮。但是後來對U-2被俘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之處置，卻又何等不公！

文天祥名言：「死有重於泰山，輕如鴻毛。」這些弟兄們的犧牲，雖然給我們以及他們的家人，帶來無比的傷痛；但是他們俯仰無愧於天地，英勇巍然如泰山，他們雖然沒有受到時人的讚美，卻值得後人的敬仰。他們身軀雖然消逝，精神卻活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。

有首詩說：「千鎚萬鑿出深山，烈火焚燒若等閒，粉身碎骨渾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」這幾句話，正是全體卅四中隊同志的寫照。

### 第4節 卅五中隊（黑貓中隊）

「黑貓中隊」是我生命歷程中很難遺忘的一段經歷。社會上一提到黑貓中隊，就會聯想到我衣某人。其實我只是參與督導其事，最多不過是這個「最高機密」的見證人。真正的榮耀，是屬於二十八位中國空軍中最神勇的一群飛行員。

黑貓中隊是中國空軍最神祕出色的一支特種部隊，他們前仆後繼、神鬼莫測，冒死穿透鐵幕，在中國大陸打開天窗。他們成果豐碩，冒險犯難。他們是真正的英雄，永遠活在我心中。

早在1956年，美國就開始用U-2對蘇聯進行空中偵照。起初如入無人之境，是赫魯雪夫心中的最痛，立誓

要將之打下。此願於1960年5月1日實現，也就是在這一日美中情局飛行員鮑爾司（Francis Powers）駕駛的U-2被蘇聯擊落，引起軒然大波。美國被逼承認了對蘇俄的侵略行為，同時也停止了U-2的活動。但在此冷戰時期，美國仍需要共產國家的情報。當時美國最缺乏的是中國大陸情報，所以在1960年中，美方先派了一位空軍准將來台與我方接觸，後改由美中央情報局負責此項工作。

當時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代表我方出面，美方則由「美海軍輔助通訊中心」的主任克萊恩代表，雙方達成協議後，本計畫即交由我去負責執行。據克萊恩說：美方供給飛機及周邊設備和技術人員費用，總預算為美金五千萬元。在此項計畫決定後，美方即派一個十二人小組，與我方研究細節。此十二人小組包括美國軍方及情報人員，這批人員於卅五中隊成立後多數返美。1960年11月，美方工作人員開始進駐桃園空軍基地，籌備地面設施等工作。我方根據協定，成立了「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」，對外則稱空軍第卅五中隊，亦稱為黑貓中隊，隸屬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。與此同時，我與雷炎均少將親自從部隊中挑了六位飛行員，同年送美受訓。其中許仲揆未完訓，完成訓練者楊世駒、華錫鈞、王太佑、郟耀華和陳懷（後來的名字「懷生」是老蔣總統親自賜給的）等五位，回國後他們就成為卅五中隊的主要戰鬥員。郟耀華後來在桃園飛行失事。

蔣經國曾當面授意：這項合作是由中美兩方的最高領袖直接指揮——美總統授權中央情報局為執行者，中

方則由蔣中正總統授權蔣經國為代表，並指定我為中方執行負責人。有關此計畫的執行，都必須直接向蔣經國報告，而不得透過空軍任何人，甚至包括總司令在內。

我當時的身分僅為空總副參謀長，而此事與空軍又有不可分離的關係；因此建議蔣經國向當時的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將軍說明，以減少我執行上的困難。他雖答應照辦，但後來仍難免遭到不少誤會；不僅陳總司令對黑貓中隊的情況並不十分清楚，連當時桃園基地聯隊長都不得接近U-2機棚廠，因為U-2機棚廠內設有高度機密的通訊電子設備。據我所知：中方僅蔣經國副秘書長和我曾進去看過。其實那些設備，大概只有專家才看得懂。

起初，中情局希望他們的人員，能享有比照美軍的福利標準（如俱樂部及PX等便利）。但我認為此項任務既然具有高度機密性，則美方人員不宜暴露身分，甚至根本不應出現於公共場合。為此，我們特別在桃園基地設立招待所，並供應所需物品；他們所用的汽車也均懸掛我國軍用牌照。而且在桃園至台北公路上，我方更安置便衣警衛，可隨時隨地保護他們的安全。

U-2進入中國大陸的偵測任務，完全由美方策劃。他們主要是參考衛星偵照和電訊等資料，當時衛星照相技術尚不完善，對地面目標雖有顯示，但都模糊不清。另外在電訊方面，中國空軍有技術大隊，情報局有「技術研究室」，兩者都是以截聽對方電訊而解讀大陸的軍情。根據這些情況，設計U-2偵照目標及航線。透過U-2

精確的照相機，雖然遠在高空，卻能將地面及目標拍攝得極為清楚。

黑貓中隊第一次出擊是在1962年1月13日七時，由陳懷駕機，經福建蜘蛛島進入大陸，飛越浙江溫州、衢縣，至安徽蕪湖、安慶、蚌埠、而至河南開封、鄭州，至山西臨汾，至寧夏、甘肅沿額濟納河至蘭州、西安，復經湖北漢口、江西南昌、福建鷹潭、南平等十餘省區。除照相及電子偵察外，並目視發現雙城子飛彈試驗場一處，武功機場駐有Tu-16型機多架，額濟納河河邊，建有良好之公路鐵道及橋梁，附近並有類似煉油廠二座、飛機場二處。終於十五時四十分安降桃園。航程三千三百二十哩，任務飛行總時間八小時又四十分。

那時起，我才領略到：我方的U-2照像，對美國竟是那麼重要。尤其在戰略上提供了美方最有利的資訊，以作為對中共談判的籌碼，和戰略布署的依據。

整個大陸偵照計畫，雖然對外用「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」，對內稱「卅五中隊」，其實沒人知道中美雙方正式簽訂的，卻是稱為「快刀計畫」，由雙方在1961年1月25日初簽。至於「黑貓中隊」的由來，則是因當時要設計一個隊徽，結果由隊員陳懷生設計了這隻黑貓。U-2機的任務多半都在清晨於黑暗中出發，黑貓的身體就象徵著攝影機，隊員們都把這個隊徽繡在他們的飛行夾克上。

黑貓中隊的出任務情形，英籍作家包柯克和翁台生

兩位先生所著《黑貓中隊》，以及1999年華錫鈞的《戰機的天空》二書，均有詳細的記載。為免重複，不在此贅述，僅補充一些重要資料。

黑貓中隊前後共有二十八位飛行員，在大陸遭擊落者有五人：第一位是陳懷。清楚記得那天是1962年9月9日，陳懷在南昌附近被中共飛彈擊中墜毀；事後有一說陳懷於跳傘降落地面後，舉槍自殺成仁，壯烈殉國。

然後是1963年葉常棣墜機被俘，李南屏1964年被擊墜身亡，1965年張立義中彈被俘，以及1967年黃榮北中彈殉國。

此外，在訓練過程中失事身亡的有鄒耀華、梁德培、王政文、余清長、吳載熙、張燮及黃七賢。

從陳懷第一次出任務，至1974年5月24日止，黑貓中隊先後共執行大陸偵照任務二百二十次，涵蓋面積一千餘萬平方公里，遍及大陸三十餘省。發現中共原子能試驗所、飛彈試驗場與發射陣地、陸海空軍事基地，及工業交通等多項重要目標，獲得極為珍貴之情報資料。對中共軍情的瞭解與運用，甚具價值。

1974年11月1日，卅五中隊正式從空軍編制上撤銷，其實撤銷前已經很久未出任務。自1961年2月1日正式設立部隊番號起，十三年來，他們寫下中國空軍最輝煌的史頁。因為U-2任務艱巨，飛行員消耗體力甚多，

所以規定每位飛行員，完成十次任務後就不必再參戰。但完成十次任務實在不易，在1967年以前，僅有華錫鈞、王錫爵、劉宅崇等三人完成十次任務，其次王太佑九次、莊人亮九次、楊世駒八次、范鴻棣五次、張燮一次、鄒燕錦一次。

有幾件事在這裡值得一提：

1965年5月27日王錫爵出任務，執行對湘、桂、粵地區偵照任務，一路上皆發現噴射機蹤影；最後王錫爵飛臨白雲機場上空，看見有戰鬥機二十餘架，附近並有噴射機凝結尾一條，這是王錫爵第一次看到白雲機場。他絕沒料到，後來他會駕華航的波音747貨機投奔中共，降落在這個機場。

另一件事是：為了紀念陳懷，台北市空軍子弟小學改名為懷生國小。當時校長陳鴻韜，蓋了一座懷生大樓，還是美國人出的錢。空軍知名雕塑家陳一帆，特別做了兩個陳懷生塑像，一個擺在懷生學校，另一個放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。

但是很少人知道新竹的「載熙國小」，也是用黑貓弟兄吳載熙命名的。吳載熙是新埔鎮大茅埔人，今天的大茅埔仍有「載熙橋」。他三十二歲時在訓練期間失事殉職後，蔣經國特別將其子命名為「興華」。

還有一件事，蔣公對黑貓成員是十二萬分關懷，常召見慰勉。偵照出來的照片，他也常親自過目，頗為讚

許。有次黑貓隊員順道拍了溪口鎮的照片給蔣公，照片上王太夫人的墓地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1974年5月24日邱松州中校最後一次出任務，替黑貓中隊十三年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寫下了句點。

今日回憶起來，我個人仍有多項感觸：

1960年，鮑爾司被擊落後，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矢口否認。但是在蘇聯宣布真相後，美國大眾一片譁然中，艾森豪總統即公開承認，他說：為了美國的利益，在事發之初確實說了謊。其坦白的態度，使美國民眾諒解他，而不再追究。此事讓我們認知「誠實的政治，就是最好的政治」，特別是一國元首若肯勇於認錯，才能深得人心。

第二，在鮑爾司被蘇聯俘虜期間，曾供出不少美方機密。但當他一年多後獲釋返國，美方不但不予定罪，反而保全其職位，酬謝他五萬二千美元，並予榮譽退役；因為他是在高壓下所做的供詞，所以不能以「通敵」論罪。這種人性的判斷與人權的維護，就非很多政府所能辦到。

回想我們對被俘人員的處理，就大不相同了。以U-2隊員而論，空軍的兩位戰鬥勇士——葉常棣及張立義，在中國大陸上空遭擊落被俘，受苦廿年後才獲得釋放。而我國竟拒絕接納，卻由戰友楊世駒（原卅五中隊隊長）私下斡旋，才由美方出面，把他們安置到美國，而且還為他們找到適當的工作。總算數年之後，他們終

於能回到台灣，並接受相當的表揚。

其次，中華民國當局，本來可以運用U-2偵察任務作為條件，向美國提出一些合理要求，可惜我方沒有這麼做。現在回想起來相當可惜，也有點後悔。特別是中華民國空軍折損那麼多菁英，除證明我們的訓練精良，可以承接冒險犯難的任務外，又能代表什麼意義呢？

後來越戰發生，美國F-4幽靈式戰鬥機及F-105機，以電子反制方式對抗北越的薩姆飛彈，這可以說全是U-2多年來努力的成果。

除上述事蹟外，U-2空照及我卅四中隊的電子偵察成果對美空軍戰略之貢獻，及對冷戰中美國政府之外交運用上，有無可限量之益處，自不待贅述。

回想三十多年前的往事，那些青年飛行員驚心動魄的飛行，出生入死的任務，漫漫長夜的煎熬等待，仍宛如昨日一般的清晰。我生平喜讀文天祥的〈正氣歌〉，每讀到「清操厲冰雪，鬼神泣壯烈，慷慨吞胡羯，逆豎頭破裂，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死生安足論」，就不禁想起懷生、南屏、榮北，及所有的黑貓們。



1960年，陪同美軍顧問團長桑鵬（Samborn）將軍（右二）視察桃園大溪空軍監察大隊。



1959年7月空軍監察大隊桃園大溪新營區落成。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博士前往視察。

左起為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將軍、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、美國中情局台灣代表克萊恩、俞部長、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及本人。



1957年在台北家中合影。左起：家兄復得、陳嘉尚、蔣緯國、譚伯羽、蔣經國、俞國華、本人。



1961（或62）年總統蔣公召見空軍卅三、卅四及卅五中隊隊員，嘉勉他們的輝煌戰績和英勇表現。

前排右起：郝耀華、王太佑、戴樹清、張育保、本人、陳嘉尚、李用仁、郭統德、戴邦仁、陽君玉。

後排右起：華錫鈞、楊世駒、盧錫良。

後排左起：陳懷生、趙欽、李德風、南洋、喻經國。



陪同蔣經國（右二）審視卅五中隊U-2機所拍攝之空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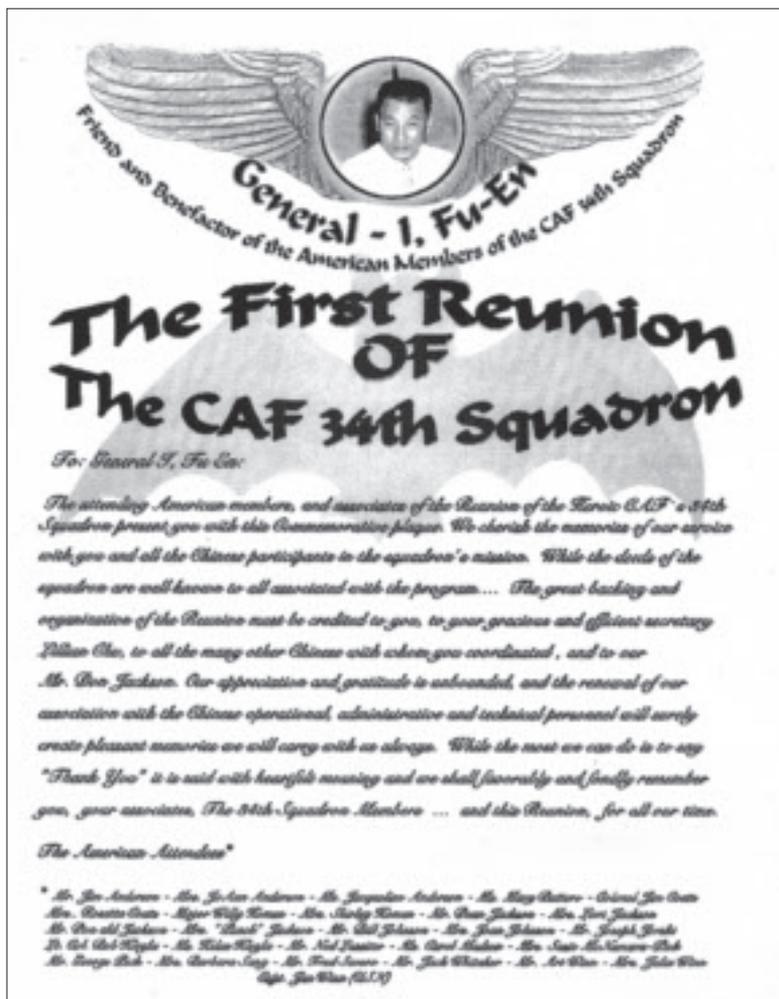
1963年，隨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將軍訪問美國空軍設在阿拉斯加極北端之Tin City的Dew Line雷達預警站。雪橇中由前至後為唐勛治、美軍官、本人、雷炎均、陳嘉尚。



1956年獲頒美國自由勳章後，與美國大使藍欽（中立者）及美國十三航空隊司令戴維司少將（左一）合影。右起為吾兒治凡、本人、小女淑凡及瑛華。戴維司旁為當時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及夫人。



1999年10月6日與當年中國空軍卅四中隊中美隊員在台北圓山飯店重聚合影。



1999年10月，卅四中隊隊員在台北重聚。美國方面，由傑克遜先生（1959~1962年期間代表中情局派駐新竹參加卅四中隊之任務）負責召集，並致紀念牌以示感念。